

## 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田野调查研究

陶朔秀<sup>1</sup>,童国军<sup>2</sup>,王明建<sup>3</sup>

(1.成都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2.川北医学院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3.成都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以民族聚落为田野考察点,以少数民族武术拳种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借助人学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7个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与传承等问题。研究发现:民族聚落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场域和主体实践空间;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传承表现为“血—地—业”交织而成的多缘并存的承继状态。具体而言,贵州麻江县龙山镇的苗拳、贵州黎平县觅洞村的黑虎拳和广西平果县春德村的春德壮拳以“血缘”为主导,河北沧州市孟村的八极拳和贵州独山县塘香村的布依拳以“地缘”为主体,云南盈江县喊撒村的孔雀拳和四川宣汉县天台乡的土家余门拳以“业缘”为主干;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师缘关系”是维系其多缘并存的纽带,“德行礼仪”是其文化品性的律令,而“功有其法、舞有其套、击有其术、拳有其理”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技理意涵的核心。

**【关键词】:**民族聚落;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武术传承;德行礼仪;田野考察

**【中图分类号】:** G85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2-0017-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322.001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中华文化认同的厚度、深度和长度。“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当前一个重要的命题和任务,就是大力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习近平,2016)”。少数民族武术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更是民族历史的记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进行研究,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当前我国尊重民族差异、包容文化多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受研究范式和学科基础的局限,少数民族武术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一方面,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武术的关注度不高,成果相对匮乏;另一方面,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少数民族武术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大多停留于宏大叙事的“现状”描述和“泛泛而论”的一般性调查,其主要体现为地域分布不均衡,学科视角狭窄,研究层次有待提高<sup>[1]</sup>,相关研究存在局限于挖掘和整理,缺乏乡土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联系<sup>[2]</sup>等问题。在国家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今天,

如何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系统知识体系阐释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整体研究水平,从传统的“作坊式”“书斋式”的研究困境中走出来,对少数民族武术进行系统梳理和翔实调查,形成独特的研究体系和研究特色,还存在着广阔的实践空间。鉴于此,研究在明晰当前现状的基础上,从民族聚落的视角,以少数武术拳种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7个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与传承等问题。在考察武术拳种的生存样态和传承图景的基础上,试图呈现其知识谱系及文化意义,以丰实和拓展民族聚落中武术拳种的田野考察,深化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学术思考。

收稿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TY107);四川省社科联、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TY2021W101)。

第一作者:陶朔秀(1985—),女,四川成都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民族民间体育理论。

通信作者:王明建(1978—),男,山东诸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育人类学。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田野是人类知识的本原,是人类总体行为的发生场所(张士闪,2019)。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收集资料 and 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sup>[2]</sup>。它往往是田野工作者通过熟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居住形式<sup>[3]</sup>,以在“田野”中达到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和阐释。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根植于民族聚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技术内涵,其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身体文化,耦合于民众劳动实践的生活事象中。因此,只有进入田野,下沉民族聚落,才能透过其复杂的技术动作,洞悉武术拳种的历史内涵并理解存在于地方社会的价值意义。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地理区位,研究从微观意义上的“民族聚落”入手,在贵州、云南和河北等地区的民族聚落中选择7个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典型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表1)进行实地调查。

表1 民族聚落中武术拳种的田野调查区域  
Tab.1 A Field Investigation Area of Martial arts in an Ethnic Settlement

序号	民族	代表性拳种	代表性传承人	民族聚落位置	民族聚落类型
1	回族	八极拳	吴连枝	河北沧州市孟村	近郊型村庄
2	苗族	苗拳	潘有森	贵州麻江县龙山镇	
3	壮族	壮拳	韦善东	广西平果县春德村	边远山区型村庄
4	侗族	黑虎拳	吴德林	贵州黎平县觅洞村	
5	布依族	布依拳	莫义猛	贵州独山县塘香村	
6	土家族	余门拳	丁耀庭	四川宣汉县天台乡	中间过渡型村庄
7	傣族	孔雀拳	杨四	云南盈江县喊撒村	

2018年5月至2021年7月,研究以各少数民族聚落为田野工作点,分别利用寒暑假和地方重要节庆活动等时间节点,采用“多次、短期、深度访谈式”的调查方式,对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空间、传承脉络和拳理要义等进行考察,并建立其与自然生态和聚落传统等方面的关联,以此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与传承等问题。同时,在调查中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作)”作业,融入民族聚落生活常态,具身体验各武术拳种的技术内涵,以求从主位和客位的立场发现和阐释问题。文章所考察的民族聚落文化特性浓郁、民族性格和地域特征突出,聚落的人口主要以少数

民族为主,甚至有些聚落表现为多民族聚居。如河北孟村是回族聚居的民族聚落,主要居住回、汉等民族,其44个民族村(20个纯回族村)中的回族占全县总人口的26.24%,是中国北方回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属于近郊型村庄。贵州麻江县龙山镇、黎平县觅洞村、独山县塘香村和广西平果县春德村,是典型的单一性少数民族聚落,地理环境特殊,境内喀斯特地貌与丘陵斜坡地带相互交错,村落依山而建,生产方式相对单一,民风淳朴,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属于边远山区型村庄。四川宣汉县天台乡和云南盈江县喊撒村,境内平坝、丘陵、低山交错,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属于中间过渡型村庄。所以考察的地点具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聚落特点和“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特征,因此所孕育出的武术拳种、套路技法也各不相同。而以“聚落”为依托衍生出的“拳种”内容、“套路”形式及“技法”意涵,不仅体现出浓郁的村落文化气息,也凸显了浑厚的村落历史底蕴,为深入探究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与传承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2 民族聚落中少数武术拳种的生存样态

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4]</sup>。这不仅指中国具有广阔的乡村沃土,或是中国农民人数众多,也指乡土对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基础的乃至全局性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是从乡土中“长”出来的文化,乡村就是其理想的驻地、生命的寓所<sup>[5]</sup>。换言之,乡村形塑出质朴的拳种技艺、保留着厚重的文化传统、续承着深厚的文化根脉。

民族聚落是镶嵌在乡村中的社会结构单位。民族聚落所具有的“乡土特征”无不滋养与浸染着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武术。可以说,“民族聚落”的乡土特征,一方面造就了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人文风貌,另一方面也形塑出丰富多彩的套路和风格迥异的技法。如深居于喀斯特山区苗乡聚落的贵州麻江县龙山镇,其“八分半山半水一分田”的传统生产生活习性,孕育出的“龙山苗拳”凸显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厚重的山地特征。代表性拳路“八虎闯幽州”中的“苗女梳头后羊蹄、蜜蜂采花、疯猿擦地”等动作,“三十六攻打”中的“顺手牵羊、毒蛇入洞、岩鹰颠鸡”等动作,既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劳动中

的经验总结,又是脱胎于生产生活实践的一种身体技术,而“手法丰富、腿不过腰、结构紧凑、注重实用和技击”的拳路特征,则反映出苗民力图在地无三尺平的地理空间中寻求“一招制敌”“拳打卧牛之地”的生存智慧。同样基于喀斯特山区的侗族黑虎拳,源起于侗族民众保己、保家、保寨的重要武装防御措施,拳势以“仿生象形”为表征,套路动作“以兽立架”,充盈着浓郁的侗族乡土气息。又如座落于湿润坝区傣族聚落的云南盈江县喊撒村,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植被茂盛,民众“傍水而居”,且自古就有信奉南传佛教的传统,自然与人文传统衍出的孔雀拳模拟孔雀出巢、展翅高飞、觅踪捕食、寻泉戏水、浴身抖翅<sup>[6]</sup>,彰显出“舞武结合”的运动体征、“亲近自然”的生活情趣、“仿生象形”的文化特征和“祭祀祈福”的仪式内涵。

民族聚落也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生存的空间聚点,它不仅为拳种技术的展示提供了有形的物理空间,也拓展了拳种文化传递的精神空间。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延存,离不开传统聚落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sup>[7]</sup>,乡村庙会、乡村拳场、家族祠堂、传统节日、祭祀仪式等场域既是聚落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也是民众练拳演武和传授技艺的文化场所。如四川宣汉县天台土家族每年三月三的“春祈节”,当地拳师们会通过展示余门拳的“二路黑虎链”套路,在交流切磋、比拼基本功的同时表达土家族先民们对图腾信仰“虎”的崇拜,希冀能够得到祖先的庇护,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贵州独山县塘香村的上梁仪式,在仪式中本家之人与外家之人在你来我往中展示布依拳套路,以比武、演武、切磋技艺等,而这些武艺展演在少数民族的村落空间中不胜枚举,不仅丰富了村落民众的业余生活,也使武术拳种在聚落中得以繁衍生息。由此可见,民族聚落既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形成、发展、演变<sup>[8]</sup>的历史场域也是其主体实践空间。

### 3 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传承图景

传承具有传递、接续、承接、沿袭创新、承上启下之意。文化传承强调的是文化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纵向传继,是文化在时间上世代传递的过程<sup>[9]</sup>。而武术的传承是其作为文化的“历时性”传播和社会习武群体的代际成员间纵向传继的过程。从传统

社会时期到现代社会发展时期,对民族聚落中的少数武术拳种而言,可谓经历了从“家庭家族”的血缘到“同乡邻里”的地缘与“社会分工”的业缘的历时性传继,表现以“血缘”为主导、以“地缘”为主体、以“业缘”为主干的承继及多缘并存的承继状态。

#### 3.1 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传承:以“血缘”为主导

“家族本位,言传身教,赓续艺脉”一直是民族聚落中传统技艺传衍脉络的体现。因为在民族聚落中以家族为单位的传统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共同体,也是生产共同体。全体家庭成员,被经济利益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家庭以血缘关系与利益关系为纽带,表现出家族至上的家族主义<sup>[10]</sup>。在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民族聚落,“血缘”传习技艺非常明显,家技代代沿习,形成“牢守祖业、族有世业”的约定俗成,而孕育于民族聚落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也遵循此传承惯习。

贵州麻江县龙山镇的苗拳,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武术拳种。从创拳人潘治臣(1891—1969)至今,龙山苗拳已传承4代之久,在传承中潘氏家族非常注重家族技艺的沿袭,通过对龙山苗拳传承谱系的梳理(潘治臣→潘柏高、潘世美、潘世庸、潘世恩→潘有森、潘有良、潘有烈、潘有松、潘有春、潘有万→潘奇君、潘奇贵、潘奇扬;潘治臣→龙朝江→龙昌盛→蒙光付、贺福恩、龙廷武、龙薪全),足以说明宗法血缘纽带是这一拳种传衍的主脉。当然,除了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家族内部方式传承之外,龙山苗拳还借助地缘、姻亲关系纽带进行传播。如1977—2010年,潘氏家族在大塘、复兴、河坝、干桥等村寨收徒百余人,传武足迹遍于龙山、平定、笔架、基东、宣威、下司、杏山、回龙等地。龙山苗拳的支系——下司苗拳,则是龙山苗拳的姻亲传播。“下司龙家是我姑太的嫁地,姑太也就是我爷爷潘打匠(潘治臣)的妹妹,姑太嫁到下司后,因为‘家拳’是传男不传女,所以我姑太的儿子龙朝江来这边习武,学习后教给他的儿子龙昌盛,龙昌盛生活在回龙镇,后又将武艺传给亲属蒙光付、贺福恩、龙廷武、龙薪全等人”(访谈对象为龙山苗拳第三代传承人PYS,2021年8月19日于龙山镇龙山中学)。由此可见,龙山苗拳的传承脉络体现以家族“血缘”为主导的传承和“模拟血缘”关系构建及村落邻里“地缘”传承的多线互构。贵

州侗族黑虎拳的传承也是以“血缘”为主导的典型例证。贵州侗族作为典型的群聚社会,集体观念强烈,宗族房屋和宗族社会制度在族群内部深有体现,其内层关联实际上是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的亲疏在侗族黑虎拳的历史传承中起主导作用,对觅洞村黑虎拳传承谱系进行梳理(吴炳周→吴家胜、吴家清→吴光华、吴光荣、吴光基→吴德金、吴德林→吴顺财、吴顺高→吴海成、吴成宇),可以看出觅洞村黑虎拳的传承依附于以“房族”为脉络的传承。此外,广西春德壮拳也是以“血缘”传承为主导的聚落拳种,广西春德村历史文化悠久,隶属于平果市,古为百越地,是壮族村落文化的典型代表。春德村独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生态,为春德壮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生存土壤。就壮拳的发展历程而言,其历经了土司间征伐、宗亲之争、“土流”之争、瓦氏东征倭寇等事件,逐步沉积到了明清两代与各方文化互化与整合,至清代末期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壮拳。自佯兵教官蓝廷高于明清时期将壮拳技艺传于韦永华,就春德壮拳传承谱系(蓝廷高→韦永华→韦安群、韦安英→韦焕堂→韦善军、韦善东)而言,体现出依托于“父子相传”,以家族为单位,以“血缘”为主导的传承。

### 3.2 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传承:以“地缘”为主体

在民族聚落中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易于在传统民族心理基础上促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使得一个拳种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区域内传习,从而形成鲜明的地缘性特征<sup>[10]</sup>。在调查中,河北沧州市孟村的八极拳和贵州独山县塘香村的布依拳在传承上,以“地缘”为主体的传承痕迹表现的尤为明显。

孟村为八极拳发祥地,有“武术之乡”之称,其作为开门八极拳的元传播地,门内弟子主要以孟村、沧县、天津等地为主。据考释开门八极拳的第二世传承人吴钟,为孟村人,他依靠“人地”的关系建构了开门八极拳以孟村为起点进行传承与传播的方法路径。究其根本,在于当时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的不便,开门八极拳的传播必然先在孟村及周边村落就地就近进行,体现出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在“人地”的关系下“就地就近”的传承特点,也凸显开门八极拳传承谱系中的地缘认同。此外,就孟村武术组织而

言,具有浓厚的地缘色彩,对维系当地的社会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把式房”是血缘、地缘组合成的一种民间组织,是乡土社会中孟村武术人的活动场域,同地同村之人借助“把式房”操练八极拳建构当地的社会网络,不仅推进了八极拳的地缘传承,也和谐了村民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开门八极拳研究会到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的成立,是我国由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向在孟村的现实写照,此组织不仅拓展了八极拳地缘传承的宽度与广度,也为孟村八极拳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地缘传承是孟村八极拳传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也映射出少数民族武术拳种传承中须臾不可离的依托。田野调查点的塘香村为典型的布依族聚居村落,是远近有名的“武术之乡”,村寨现有人口约1200人,由莫姓、黎姓、韦姓以及少量的陆姓布依族人口所组成。其中,莫氏布依族人口占其村寨总人口的82%以上。塘香村的村落组织是以莫氏血缘宗亲为主体的宗法制与数寨而立的寨老制建构起来的,而村落武术组织制度也正是基于这种宗亲血缘与地缘关系而建构的基本社会关系。因此,塘香村布依拳的传承和传播主要以子、侄、叔、父的“血缘”关系和利用地缘文化与节事、节气、节庆、节点进行。如布依族中的丧葬、嫁娶、立新房是其族群生活中的3件要事,布依拳常融入其中,在上梁仪式中人们通过演武、比武以渲染气氛并进行交流互动,由寨老安排宾客入席后,主家则会抬出早已准备好的佳酿“土酒”用以款待来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本家之人便会率先登台演武,外家必以武相对;本家要上一套刀术,外家之人便得要一套刀术;本家要上一套拳术,外家便应得一套拳术。期间你来我往,众人高声喝彩好不热闹。这种融地方习俗“耍拳”“亮拳”的村落传统,以村落为依托,呈现以“地缘”为主体的传承。

### 3.3 民族聚落中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传承:以“业缘”为主干

在中国武术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传承特征总体表现为,以“血一地一业”交织而成的多缘并存的承继脉络。然而,由于拳种的个体差异和地理文化生态的区别,所以在其传承形式上也各有其不同。傣族云南盈江县喊撒村的孔雀拳和四川宣汉县天台乡的土家余门拳,

则体现出以“业缘”为主干的传承。

傣族云南盈江县喊撒村的孔雀拳,是源于孔雀舞并派生于傣族的“旦拳”。据资料记载,1984年,德宏州民委委托著名舞蹈家、武术家约相广拉结合傣族文化创编一套傣族武术套路。约相广拉将孔雀舞基本动作和小四门拳术相结合创编了一套具有傣族文化特色的武术套路,由于拳术套路动作大都是模仿孔雀舞蹈创编而成,于是取名为“孔雀拳”。就其孔雀拳传承脉络而言,有两位代表性人物约相广拉和杨四。作为孔雀拳创始人的约相广拉在1986年和1994年先后参加了云南省第三届和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分别获得拳术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好成绩。2006年6月,孔雀舞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舞蹈家身份的约相广拉借机将孔雀拳进行了传承和推广,通过学校传习孔雀拳并建立孔雀拳拳法研究会,同时借助当地重要的传统民俗,诸如泼水节、中缅胞波狂欢节、傣历新年节和摆少散等庆祝活动进行展演。在约相广拉的言传身教之下徒弟杨四技艺精湛,于2010年获得第九届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武术项目冠军,2011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武术项目第三名。由此,这项“由舞而生”的拳术,在拳师、学校、政府等多方力量的合力下,逐渐形成以“业缘”为主干的传承形式。土家余门拳是流传于川东地区,源起于华佗的“五禽戏”,属于峨眉拳系的土家族拳种。依据《四川武术大全》记载,余氏后裔余有福在1775年正式创立余门拳。2008年,宣汉县文化馆将余门拳重新命名为“土家余门拳”。据考察,余门拳创始人余有福最早在宣汉南坝镇泡桐树(现南昆大桥)开馆授徒,传授弟子众多,众弟子中熊学能天资聪慧,勤学苦练,是余门拳的第二代传人。熊学能学成后又在达州开江地区开馆授徒,传弟子向平。据《宣汉县志》记载:“向平师从熊学能,习得余门拳……用拳攻击房柱,屋顶上的瓦片都会掉落,平地起跳便可上房梁。”<sup>[11]</sup>向平在练武过程中常在天台乡河边以手击石,以脚踢河边鹅卵石,久而久之使其双手指甲全无,双脚脚趾磨平,故人称“九头狮子铁板脚”。向平后将拳技传弟子丁承寿与郑道生,在民国24年(1935年),郑道生在宣汉县创办“国术馆”传授土家余门拳。至此,土家余门拳在宣汉名声大振。丁承寿授其子先钦、先锡、先铨。先锡复传

其子荣朝、荣谦、丁宪章。丁宪章传侄丁举高。1949年后,丁举高系统地将“余门拳”梳理并传给儿子丁世玉、侄孙丁长福,侄曾孙丁耀庭。近年来,土家余门拳借力非遗契机和旅游文化节,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展演活动,在进行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同时也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形成血缘、地缘、业缘并存的传承形式,突显以“业缘”为主干的传承。

#### 4 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知识谱系

##### 4.1 师缘关系: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多缘传承的纽带

众所周知,师缘是历史上传统武术延绵不绝的主要生命纽带<sup>[12]</sup>。对民族聚落中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而言,其传承特征表现为以“血一地一业”交织而成的承继脉络,然而无论是以“血缘”为主导,还是以“地缘”为主体抑或以“业缘”为主干的承继,都离不开“师缘关系”。

我国少数民族聚落基本上采取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模式,村落与家族几乎重叠,居住着由许多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家庭<sup>[13]</sup>,其共同特点是家族聚族而居,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村落结构及以农业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地缘与血缘高度一致的聚落形态,不但缔结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也为其武术文化的传承奠定基石。如河北回族孟村开门八极拳,就祖源历史和传承谱系而言,回族吴氏祖讳祚永公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奉诏特授直隶河间府沧州盐运司运判,由徽州府歙县(仅安徽歙县)阖家迁沧,落居沧州南关,吴姓回族在沧州繁衍生息,丁兴户旺<sup>[14]</sup>。孟祖后人吴钟以“两仪顶”即“吴”字篆书象形为根式(起式)创拳,据孟村《县志》中记载,18世纪70年代始,吴钟设场授徒,开始仅限在孟村周围村庄,后来延伸至今县境内罗潼、新县、杨村、堤东、挂甲林、姚庄以及沧县、南皮等地,八极拳也由家族血缘传承走向地缘传承。依照《吴氏开门八极拳秘诀传承大谱》,从吴氏八极拳创始人吴钟至八世嫡传吴大伟,吴氏开门八极拳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发展8余世。时至今日,吴氏家族仍然在“父子与儿子”以及“师父与弟子”的两种框架内展开其传承,即是以家族内“血缘下真父子”和通过“递贴拜师”后的“模拟血缘下师徒似父子”的传承方式。改革

开放后,随着孟村开门八极拳研究会的成立及社会的关注,八极拳以更加多元化的传承方式,面向社会继承、推广和传播。纵观贵州苗族的龙山苗拳、侗族觅洞村的黑虎拳及其他几个民族拳种,其传承方式上均体现出上述特征,即首先是血缘关系的传承,构建在以家族为基础的传承方式,如父传子、子又传孙的模式,家族承担主要的延续责任;其次是模拟血缘关系传承,如通过仪式性的拜师成为入门弟子,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规训,建构模拟的血缘关系;最后在契约关系基础上衍化生成现代武术的师生传承模式。当然,在此传承过程中,无论是血缘传承,还是地缘传承抑或业缘传承,都离不开以“师缘关系”为表征的承续方式,而“师缘关系”这种从历史深处走来具有历史年轮的承续传统,任以旺盛的生命力浸融于当下民族聚落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传承文脉中。

#### 4.2 德行礼仪: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文化品性的律令

德行礼仪是一个观念体系和行为品质的统一体,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品质、人格等要素<sup>[15]</sup>,反映在武术之中即是“武德”,即是从武、用武、尚武之德性。其实,武德的实质和核心是对习武者的一种内在的制约机制<sup>[16]</sup>,是武术文化传承必须遵循的价值规范。“谈玄授道,贵乎择人”<sup>[17]</sup>“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师者如父”,自古就是传统武术传承的准绳,这既是自古以来武术修行者遵从的道德范式,也是对武术德行礼仪的话语诠释。在套路、拳种各不相同的民族聚落中,习武者除了遵从这种“言传身教、口传心授、德行为先”德行规训外,还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武德话语体系。田野调查发现,每个拳种都有自己标志性的礼仪准则。如深居贵州腹地的侗族黑虎拳的“请客礼”“毕手礼”,苗拳的“启手礼”,通过平进3步,退一步,立“钉字桩”;左掌斜盖右拳,大拇指紧收,两手拳掌重合,向左右摇晃3次即毕<sup>[18]</sup>动作,表达“我者虚心请教,他者皆为我师”的文化意涵。回族八极拳注重人德与武德的综合,因此,八极门“明确规定不可恃血气之勇欺压乡里;不可贪图小利害及同胞;不可恃血气之勇罹杀身之祸;不可呈自身之刚强灭他人之志气;不可因比试之胜负引类呼朋,以致同室操戈”等武德规训。土家族余门拳的“四授四不授,四打四不打”的武德门规和贵州苗拳、侗拳、布依武术

的“三教、三不教”的规定。“师傅要求徒弟具有‘武志、正义、民心’的行为准则,言行要符合道德行为准绳,在收徒上有‘三教、三不教’的规定,‘三教’为心地善良者教、孝顺父母者教、贫困者教;‘三不教’是偷盗者不教、懒惰者不教、富人子弟不教”(访谈对象为WJH,2020年8月19日于贵州麻江县非遗保护中心)。而这种延续于少数民族聚落的地方传统,既滋养和规训着民间习武者的道德行为,也塑造着当下乡村运行的伦理规范,维系着乡土社会的共同体精神<sup>[23]</sup>,也是少数民族武术拳种德行礼仪的具体体现。

#### 4.3 拳种要义:少数民族武术拳种技理意涵的核心

拳种是指在一定人群中传承,具有完整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的拳术种类<sup>[19]</sup>。它作为武术的本体表现形式,是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术发展成熟的标志,是武术文化表达的重要窗口。在田野实践中发现,回、苗、土家、侗、壮等7个民族聚落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都有一套严密的技术谱系和学理逻辑。总而言之,既有自身的“个性”特点也彰显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共性”特征。通过对以上武术拳种的实地考察,将其拳种要义,归绎为功有其法、舞有其套、击有其术、拳有其理等4个方面。

其一,“功有其法”(桩功),民族聚落中少数武术拳种的功法基础。“桩在拳里、拳在桩里”<sup>[20]</sup>,是“桩功”的基本存在形态,民间拳师认为练桩即练拳,拼拳即比桩,甚至将“桩功”作为评判拳师功夫高低的标准。“我们这里的功夫比拼常以桩功较力,一般是高桩搞不过矮桩,武术上就是矮桩打高桩”(访谈对象为侗族拳师WH,2020年7月10日于觅洞村母寨)。所以,民族聚落中的武术拳师特别重视对“桩功”的习练。如回族河北孟村开门八极拳筑基功夫“两仪桩”,注重四面八方的“十字劲”,来提升习拳者自身的坚定性和抗应能力,代表性动作“狮子抱球”“霸王硬开弓”“二郎担山”等均是“两仪桩”变化的延伸;苗族龙山苗拳的“藏山桩”,是套路“八虎闯幽州”的基本动作,要求习练者,无论前弓或者后坐,两脚着实紧贴地面,凭借地面支撑,力心寓于期间,拉不动,推不倒。进可攻、退可守,似山之挺立毅然不动,故取名“藏山”;侗族武术黑虎拳中的“矮子桩”,融于“四门拳”和“黑虎手”套路之中;土家族武术余门拳的桩功(站桩、吊桩和铁板桥功),

讲究重硬,发力沉脆、劲刚有力,具有铁马沉桥的南拳风格,体现“卧练铁板桥,体魄如钢坚”的技法特征,而这些都是民间拳师口中“练桩即练拳”即“桩在拳里、拳在桩里”的身体呈现。

其二,“舞有其套”(套路)。套路是中国武术集中体现的外在活动特征<sup>[21]</sup>,少数民族武术的套路,可谓洋洋大观,异常丰富。回族八极拳中的“八极小架”“八极单打”“六合大枪”等;苗族龙山苗拳的“十二套基本功”“三十六攻打”“七十二擒拿”“八虎闯幽州”“苗族青龙刀”等经典套路;侗族黑虎拳的“四门拳”“黑虎手”“洪门棍”等套路;春德壮拳中的“七星拳”“纷撒”“天罡拳”“老虎摆尾棍”“蜡烛棍”;布依拳的“断砍掌”“四方拳”“布依大刀”;土家族余门拳的“二路黑链”“七星链”“余门挑刀”;傣族孔雀拳的“三十六拳技”“小四门拳”“孔雀双打拳”等套路。

其三,“击有其术”(技法)。武术的本质是技击,就生发于沟壑纵横、草茂林密地区,相对地理环境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武术拳种而言,技击属性更为突出。回族八极拳以“崩撼突击”“挨膀挤靠”“贴身劲发”为特色的基本技法,发力时,要求三力合一,即由踩、碾、闯等三力合成。同时,还利用人的头、肩、肘、手、胯、膝、足、尾把大部分(皆人的棱角部位)进击,进而横冲直撞,三盘并发,彰显“动如绷弓,发若炸雷”之力和“晃膀撞天倒,跺脚震九州”之势,凸显回族“稳健坚毅”的民族个性;苗族龙山苗拳,以“八法”(桩、身、步、手、进、顾、气、三性调养)为主干,注重手法,四方攻打,以快制胜;侗族黑虎拳、土家族余门拳、春德壮拳、布依拳,在技法中腿法少、手法多,注重肘法的运用,短打紧凑、动作迅猛,力求一招制敌,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傣族的孔雀拳与其他拳种有所区别,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文化背景,深受佛文化浸润,以仪式、舞蹈与武术动作相融共生,在技法上多以“仿生象形”为技击特点,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也反映出傣族崇尚自然、爱好和平、珍视生活的集体意识。

其四,“拳有其理”(拳理)。拳理作为武术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指导武术实践的重要依据,既是体现拳法的核心文化内涵与精妙之处<sup>[22]</sup>,也是支撑拳种技术体系的核心。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拳理,总体而言,是民间拳师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为理

论支撑,在自身经验和实践感悟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建立起来的一套拳术理论系统。回族武术中孟村八极拳的拳理是吴钟基于伊斯兰教“真主无形,无事不知,无处不在”的思想观破译道家《易经》,并以此指导八极拳技法;傣族的孔雀拳则融佛家“涅槃之道”的内敛观以及易经“以动为主”的身体观为拳理;龙山苗拳、春德壮拳、土家族余门拳、侗族黑虎拳及布依拳,皆是拳师以自我实践感悟为依托,借阴阳五行学说立拳绎论。如“春德壮拳”拳术的八卦拳、七星拳、天罡拳等套路,龙山苗拳的“阴阳师拳头”的阴阳掌,余门拳的“七星链”等器械套路。这皆是融入个人风格专长,彰显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sup>[23]</sup>,最终造就了形式多样的拳种套路。

## 5 结语

如何从田野调查揣摩武术人类学的方法与视野<sup>[24]</sup>,从人类学的“村落”“田野”和“地方性知识”等维度解读武术拳种生存与传承依然任重道远。而尝试以民族聚落为观察视角,通过对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生存与传承的考察,以呈现拳种的知识谱系及文化意义,正是对“任重道远”学术之路的理解和实践。这不仅是对武术人类学的田野践行,也是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的继续深化,更是对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术回应。

## 参考文献:

- [1] 张忠杰,龙宇晓,张宝根.中国少数民族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2):3-11.
- [2] 王明建.村落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3):68-72.
- [3] 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5] 方国清.乡土社会语境下传统武术式微成因分析[J].体育学刊,2014,21(4):7-12.
- [6] 张延庆.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阐释[J].体育文化导刊,2009(1):137-140.
- [7] 刘尧峰.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4):135-138.
- [8] 薛立强,王岗,黎桂华.从“乡土”到“离土”:传统武术发展的社会文化阐释[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5,31(4):58-63.
- [9] 张继梅.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J].齐鲁学刊,2013(4):63-66.

- [10] 王林, 赵彩红, 黄继珍. 传统武术传承的社会人类学解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44(12): 21-27.
- [11] 汪承烈, 邓方达. 民国宣化县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 [12] 周伟良. 师徒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现象诠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5): 583-588.
- [13] 刘晓春. 仪式与象征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4] 吴丕清. 回族武术八卦拳考述[J]. 回族研究, 2004(3): 83.
- [15] 于保中, 鲁岩. 论中国传统武德文化[J]. 军事历史研究, 2012, 26(3): 156-161.
- [16] 杨建营, 邱丕相. 从武德的实质和精神内核探析当代武术教育改革[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8(3): 112-114.
- [17] 吴旻. 手臂录 附录卷上[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张忠杰, 龙宇晓, 张宝根. 苗拳与族群认同: 中国苗拳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学研究[J]. 体育学刊, 2017, 24(6): 22-28.
- [19] 洪浩. 现代化语境中的武术门派[J]. 搏击(武术科学), 2014, 11(4): 2.
- [20] 李仲轩, 徐皓峰. 逝去的武林: 民国武林宗师传奇[M].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09.
- [21] 周伟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22] 高锋, 耿兴敏, 冯艳琼. 中国武术技术体系的构建: 基于第一性原理思维模型[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4(2): 8.
- [23] 韩晓明, 胡晓飞, 乔凤杰. “象形取意”: 中国武术的思维方式与运行逻辑[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2): 92-98.
- [24] 戴国斌. 武术人类学研究: 概念、议题与展望[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1-10.

#### 作者贡献声明:

陶朔秀: 提出论文主题, 设计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撰写论文, 修改完善; 童国军, 王明建: 资料收集, 文献查询与核对, 修改论文。

## Field Investigation into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in Ethnic Villages

TAO Shuoxiu<sup>1</sup>, TONG Guojun<sup>2</sup>, WANG Mingjian<sup>3</sup>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2.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North Sichuan Medic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0, China; 3. Graduate School, Chengdu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ethnic villages as field research points, and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article deeply discussed the survival and inheritance of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in 7 ethnic villages with the help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were also u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thnic village was the historical field and main practice space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inority Wushu. The inheritance of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in ethnic villages was manifested as the inheritance of “blood-geography-profession”. Specifically, Miao Quan in Longshan Town, Ma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Heihu Quan in Midong Village, Lipi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nd Chunde Zhuang Quan in Chunde Village, Pingguo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were mainly dominated by “blood ties”; Baji Quan in Mengcun Village, Cangzhou City, Hebei Province, and Buyi Quan in Tangxiang Village, Dush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were mainly dominated by “geography tie”; The Kongque Quan of Hansa Village, Yi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nd Tujia Yumen Quan of Tiantai Town, Xuanh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were mainly dominated by “profession tie”. As for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in ethnic villages, the “division relationship” was the bond that maintains their coexistence, “virtue and etiquette” was the rule of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merit has its method, dance has its set, strike has its skill, and fist has its reason” was the core of the technique and theory of minority Wushu categories.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s; minority Wushu; Wushu categories; Wushu inheritance; virtue and etiquette; field investigation